



“人生史”杂谈(之一)

[文章编号] 1001-5558(2009)01-0030-06

● 王铭铭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我推崇“人生史”这个概念。“人生史”研究不怎么像社会科学，它肯定不同于量化研究，虽则相比更接近质性研究，却与之差异也大。

“人生史”这个概念，可以译为 life history。最能表达其中奥妙的，莫过于 life 这个词了。不过，我用 life 这个词时，比一般用法远为郑重。所谓 life history（一般译为“生活史”），容许的研究法比较多，即使只研究“生活”中的一瞬间，也都可以叫做 life history。用人类学的有关观点来看，“生活史”，大体有注重人生过渡阶段这种被人类学家叫做“人生礼仪”的“非常时间”的，也有注重人生过渡阶段之外的种种“日常时间”的。大凡关于某些被研究者经历的时间，都可视作是“生活史”研究的对象。这样的“生活史”，与我所说的“人生史”大不相同。不管别人有没有说过同类看法，我的主张是，“人生史”研究有一个明了的前提，即被选择的个别人物的整体一生。

什么是“整体一生”？那也就是被选择的人物生死之间的生活。

这个意义上的“人生史”，与古代中国的“人物志”是有相通之处的。我的追求是历史方面的，以为要做好“人生史”的研究，最好是选择一位重要却并非路人皆知的“非常人”为对象，围绕这个人物，穷尽相关文献，进行相关口述史或口承传统（如传说、传闻、谣言、访谈）研究，将零碎的信息当作“补丁”，恢复该人物一生经历的所有事，一生所想象的物，制作某一 history of a life。



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变化。人生的变化，有些可以预期，比如，通过渐次升学而变为有职业和地位的“人才”；有些不可或难以预期，比如，意外的风波、升迁、“成圣”、隐居。无论是可以预期的还是不可以预期的，“人生史”所触及的事项，不可能不与“变”这个概念有关。

这一观察给社会科学家带来的挑战够大。社会科学家以研究“整合的秩序”为宗旨，以诸如社会、文化、经济、政体这类概念，将所有人的人生套到一个“整合的秩序”中。这些年来，不少社会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方式进行反思，揭示出这类“科学”受制于近代国族这一“整合的秩序”制约的情形。为了重新构思社会科学，有人提出了超国族的世界体系和区域体系的综合研究方案。置身于社会科学核心观念地带的社会学，则反复强调“社会”概念的不足，企图将研究导向游离于“整合的秩序”之外的“能动的个体”。“人生史”研究固然可以说跟这些再思考都有关系，可是，“人生史”研究在本质上不同于这种个人、社会（可与国族合并）及世界的“空间单位化”做法，也不同于在个体中寻找“社会化”、在社会中寻找“整合机制”、在世界中寻找“阶级体系”的思路。对“人生史”研究者而言，这三类规模不等的“空间单位”，都是紧密关联的，如同古人所说的“家国天下”，而我们观察这种关联的最好不过的方法，是研究人生。

对整体的人生的关注，不同于现代社会对于个体的关注。现代社会之所以“照顾”个体，是因为在关怀个体中要文明地消灭个体，促成结构对个人的“全权监控”。在这个社会学的视野中，“人生史”若有意义，便是在于它对于“生命政治”的揭露。“人生史”研究者关注个体，不以认识“全权监控”为最高宗旨，不轻言“生命政治”，而是以更好地把握“生命的意义”为目的。

俗话说说的“生命的意义”，内涵主要在“成就感”，而一旦说到“成就感”，就不能不说，它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世界的。

以“力”为核心的人生观

“生命的意义”概念，有哲学的基础。大致比较则可知，近代社会科学虽则曾从生物学中获取“有机体”概念的启发，但其研究的基本方式，是设定被研究物为无生物。将生机勃勃的人生，切割出一小段来“解剖”，消灭了它的生命，将之当作“整合的秩序”中一个微小的、固定不变的“原子”，为的是替“整合的秩序”寻找其所需要的人的支撑（在这个意义上，“人物”已荡然无存）。我以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之所以难以脱离这种“人生的消减”，乃是因为，这类研究的哲学前提为西方宗教观念中的“灵魂”。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生命的意义”，其哲学依据来自另一种境界。这一境界，不是某一文化的特殊造物，而是广泛地存在于人类学研究的“原始社会”与“古式社会”之中。在这些不同类的社会中，“力”不表现为关系结构中的“支配性”，而表现为一种“生命”。从西方宗教观念角度来理解这类“力”，研究者时常将之翻译为“灵”。固然也可以说，这种注重“生命”的“力”的观念，总是以“灵肉混融”的观念为前提的。说它有“灵”，本不是大错，然而，将之翻译为“灵”，则无法把握其本有的“生命的意义”。也即是说，“灵肉不分”的“力”，乃为“生命”，而“人生史”之研究，正是要在这个生命感

的哲学诠释基础上展开探索。

“生活的说明”

“人生史”研究可预期的一个发现是：置身于宇宙中生活，乃为人生与世界之一切。

在对“生命的意义”给予充分重视的中国哲学传统中，对这个道理早有论述。到了近代，在西式“灵魂哲学”压力下，这些论述重新涌现。

举梁漱溟为例。这位出生于清末的人物，深刻感受“西化”带来的危机，于是，综合了儒家思想，以之为体，将佛教哲学和少见的西方“生命哲学”糅合，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梁漱溟以“意欲”为根本，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意义，认为宇宙是在生活中形成和存在的。

梁漱溟有关西洋、印度和中国哲学“三型”的划分，其以儒家学说为人类文化理想归宿的做法，以及关于农业引导工业，实现民族复兴的“计划”，皆可存疑，但他对于“生活的说明”，精彩地展示了“人生史”研究所需的哲学视野。

在《东西方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进行了“生活的说明”。他说：

照我的意思——我为慎重起见，还不愿意说就是佛家或唯识家的意思，只说是我所得到的佛家的意思，——去说说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相续”，唯识把“有情”——就是现在所谓生物——叫做“相续”。生活与“生活者”并不是两件事，要晓得离开生活没有生活者，或说只有生活没有生活者——生物。再明白的说，只有生活这件事，没有生活这件东西，所谓生物，只是生活。生活、生物非二，所以都可以叫做“相续”。生物或生活实不只以他的“根身”——“正报”——为范围，应统包他的“根身”、“器界”——“正报”、“依报”——为一整个的宇宙——唯识上所谓“真异熟果”——而没有范围的。这一个宇宙就是他的宇宙。盖各有各的宇宙——我宇宙与他宇宙非一。抑此宇宙即是他——他与宇宙非二。照我们的意思，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由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似一的宛在。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这样大的生活是生活的真相，生活的真解。^①

“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听起来颇有类中心主义的嫌疑，不细细琢磨，就会将梁漱溟说的“生活”误当“人之常情”。而梁漱溟想说的，既关乎“人之常情”，也关乎宇宙的理解。他把生活自身视作世界的本质，把生活视作是高于“生活者”的存在方式，认为“生活”才使世界“生生相续”。这可谓一种“动态”的宇宙论与人生观。这个意义上的“动态”，不与“静态的整合的秩序”形成对照，而是与“动态”的“生活”之承载物——生活者或生物——形成对照，且对照不是要切割关系，在梁漱溟看来，“生活者”的本质恰在它的“对照物”——“生活”。

^①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M]. 第1卷.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76.

生活即为宇宙存在之本这一说，是哲学命题，表面似与社会科学研究志趣不相投合。社会科学研究生活，旨在理解人的关系，通过人的关系的把握，达到理解“整合的秩序”的目的。而这种本体论的生命观，不局限于“整合的秩序”，把眼光投向“天”或包括人在内的宇宙。这便使这一“生活的说明”难以在社会科学中找到自身的位子。

然而，梁漱溟进行“生活的说明”，对于社会科学的再构思意义重大。先不说其总体思路，将视野限定在其所谓“生活的表层”，可见其“生活的说明”已触及了社会科学关注的“具体的人”的“浅层次”。梁漱溟将“生活的表层”视作在某范围内的“事的相续”，即一“事”，一“事”，又一“事”，如此涌出不已，无已地“相续”。“事的相续”是“表层的生活”的实质。“表层的生活”虽是“小范围的生活”，却由人的“意欲”指向“殆成定局之宇宙”的努力。在人生的努力中，有这六样“工具”居间活动，造就“事”的往复。这些工具为探问或追寻的工具，包括眼、耳、鼻、舌、身、意。人生靠感觉与宇宙互动，“相续而转”，因而，自身“貌似坚顽重滞之宇宙”。^①

人生与宇宙之合一，听似抽象，其实具体。梁漱溟接着将人生与宇宙分别视作“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与“现在的我”（或“现在的意欲”），认为，“小范围生活”，即是“现在的我”向着“前此的我”的奋斗努力。何为“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这决非个人反观的“以往”，而是物质世界以“能为我们所得到的色感、声音、硬度”等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影子”。倘若人生即宇宙的“影子”，那么，所谓“现在的我”，便是人生的“心”或“精神”，“是当下向前的一活动”。^②

“当下向前的一活动”，是“现在的我”与作为宇宙的“影子”的“此前的我”作斗争的努力。花费不少精力论证“奋斗”概念对于“生活的说明”的意义，梁漱溟认为，“奋斗”即是克服“现在的我”要求向前活动面对的“前此的我”造成的“碍”。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宇宙的影子”的“此前的我”，通过对于身外物质条件的限制，设置出“现在的我”需克服的困难。“奋斗”指的就是“现在的我”改变“前此的我”的局面的行动。所以，“凡是一个用力都算是奋斗；我们的生活无时不用力，即是无时不奋斗，当前为碍的东西是我的一个难题；所谓奋斗就是应付困难，解决问题的。”梁漱溟认为，“奋斗”几乎是一切生物的生活。这个意义上的“奋斗”，相当于时下所谓“能动”（agency），有别之处在于，这一“能动”不纯为个体性的，也不纯为社会性的，还间杂着宇宙的“能动”。对人而言，“无论为本能的或为有意识的向前努力，都谓之奋斗”。^③

自我困境

在“人生”意义上，梁漱溟的哲学是在“自我”与“他者”交融中展开的，其论述若显“模糊”，那也是因为他采取的概念体系全然不同于“自我”与“他者”二分的西方“自我论”。在他看来，“此前的我”之实质，既是“我”，又是“宇宙的影子”，不是脱离

①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M]. 第1卷.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77.

②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M]. 第1卷.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77~378.

③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M]. 第1卷.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78.

世界的“自我”。这个既是物质世界又是“自我”的存在方式，对“现在的我”——能动的人——构成矛盾，使人生体现为对这个物质世界—自我混融的“我”的连续不断的“克服”。若硬要如同人类学家那样，将梁漱溟的“人观”与西方的“自我”作跨文化比较，那么我们也只好说，这一“自我论”“混淆”了人与世界。

在梁漱溟那里，“现在的意欲”或“自我”之价值实现，等同于“我”对物质世界—自我混融的“我”的克服。因而，人生既是由相续的“奋斗”组成的，又通常包含这以下“自我的困境”（我的理解）：

1. 物质世界与“他人”的“我性”，一方面使人生（“现在的我”）在克服“此前的我”时，不断醒悟到“此前的我”乃为“现在的我”自身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在面对“他者”时，不断醒悟到他们各有与“我”相通的“现在的我”。尽管人总将他人视作“此前的我”的一部分，但难办的是，这一“此前的我”，与“现在的我”一样，是有与“现在的我”相通自我。

2. 因果法则和自然律限制人的“奋斗”（能动）之功效，使人时常醒悟到“功效”的人生论的局限。

3. 人生除“奋斗”之外，还必定有“如乐极而歌，兴来而舞，乃至一切游戏、音乐、歌舞、诗文、绘画等等情感的活动，游艺的作品”，这些“差不多都是潜力之抒写”，所以不属于“奋斗”，它们是“自然的流露而非浮现于意识之上的活动”，在本性和态度上，与“奋斗”全然不同。而它们却是人的“潜力之抒写”，必定是人生的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梁漱溟反复提到“物质”这个词语，且将世界之本原视作“生活者的生活”。这一貌似“物质主义”的哲学，与“心灵主义”构成鲜明反差。然而，深受中印哲学双重影响的梁漱溟之特殊之处在于，他的哲学，并非可以用“物质主义”或“心灵主义”来加以定义。这一哲学，寻求心物之通，不断在有“意欲”的人的奋斗与作为“意欲”的最高境界及限定的“非我”之间寻找纽带，且将“生活”（即我所谓“生命”与“人生”）视作联通心物的纽带，更接近于“泛生主义”（即将死亡与沉寂、与“不朽”相联系的人生—宇宙观）。

哲学意涵

在两层相互关联的意义上，“人生史”研究奠基于这类哲学的思索：

1. “人生史”研究，集中于“人物”，人与物在此意义上，可借梁漱溟的“生活的说明”定义为“现在的我”与“此前的我”，而不可借西式“自我”与“他者”的二分法加以界定。也即是说，人与物，都是“我”，而不是“物割裂于人之外”。人“奋斗”，而成“人物”，“人物”便是典范地呈现宇宙的意义的人，而非受“超我”压抑的“自我”。因此，研究被选择人物的“人生史”，便是研究一人的“事的相续”，透过这一“事的相续”，揭示人物的意涵。

^①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M]. 第1卷.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78~379.



2. 在较低的一个境界上,“人生史”研究,也是心物研究,它在关注人的“奋斗”与“奋斗”的困境中,呈现人生对人生的激励与限制,在同时认识“自我的他性”和“他性的自我”中,在物质世界中看到心,在心中看到物质世界,在“奋斗”中看到因果与自然律,在因果与自然律中看到“奋斗”,在艺术中看到生活,在生活中看到艺术,在创造或“潜力的抒写”中看到“日常实践”的“异化”。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再度诠释了人生的道德境界,从人生与作为社会关系互动的集体伦理产物的人心之间的互构关系上,解析了人生作为人心的基础却又难以脱离人心的“辩证法”。梁漱溟指出,人心是在人的社会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建筑于人心之上的社会,又对人生。“心非一物也,固不可以形求。所谓人心,离开人的语嘿动静一切生活则无以见之矣。是故讲到人心,必于人生求之。而讲到人生,又不可有见于个体,无见于群体。群体谓始从血缘、地缘等关系而形成之大小集团,可统称曰社会。人类生命盖有其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之两面。看似群体不外乎个体集合以成,其实个体乃从社会(种族)而来。社会为本,个体则其支属。人类生命宁重在社会生命之一面,此不可不知。即人生以求人心,若只留意在个体生活上而忽于其社会生活间,是失之矣。(于体则曰生命,于用则曰生活;究其实则一,而体用可以分说。)”^①这个“辩证法”,颇接近于社会学家论述“个体社会”的“良知”之说,甚至可被用来翻译后者。

[收稿日期] 2009-01-12

[作者简介] 王铭铭(1963~),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北京 100871

Several Issues in Ethnic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Ma Rong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ystem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re are labor flows from rural areas to cities and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in today's China. The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population flows help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to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and local economy, but also make the contact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ethnic groups became much more intensive. Facing the new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government, Majority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have to adjust themsel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end in ethnic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and provid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 words: temporary migration, ethnic relations in urban areas, government policy

(* P. 6)

^①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M]. 第3卷.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538~539.